

“叩两端”：钱基博文学史价值观新探

——以《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中心

唐金海* 陸穎蓉**

<目次>

- 一、“叩两端而探其传承”——《现代中国文学史》起止的脉络
- 二、“叩两端而察其所变”——从王闿运到胡适的两大转向
- 三、“察其变而观其所扶”——钱基博在两种转向中所持的立场
- 四、“观其执而究其所因”——钱基博持此态度的原因

1933年前后，钱基博所著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很快引起文坛注意。至今的八十余年间，对该著及其作者也时有研究，评价文章也偶见于报刊。但笔者发现，对于该著何以以王闿运起笔、以胡适结篇，以及作者蕴于其中的深意和由此透露的文学观念等，多年来学界鲜有论及，更乏深论。本论就试图从这一角度切入，以《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中心，以求深入探究大学者钱基博文学史价值观的底蕴，庶几有助于当下文学史观念的进一步探讨。

一、“叩两端而探其传承”——《现代中国文学史》起止的脉络

文学史著作虽然需要寻绎“史”的规律，虽然需要客观地罗列事实，但是它决不是简单的材料堆砌，所选取的事实材料也一定无法避免主观性，其中必然包含编著者的个性价值判断。实际上，一本达到最大共识性又具有个性的文学史才是

一部真正成功的史著。

钱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显然也无法摆脱著者的思想烙印。钱基博十二岁时，适逢戊戌变法。这场1898年发生的政变，作为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关键点，不仅是清末民初的一个中心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中值得一书的重大转折点。自然它对钱基博的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幼承家学、深受私塾教育影响的钱基博，“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影响”，“开始从事‘新学’，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进行自学。”¹⁾并逐渐开始接触西学，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甚至“有时即瞒着父兄，取家中藏的经史，到书铺去换取上海制造局出版各种物理化学书看。”²⁾

戊戌变法对钱基博的重大影响，折射到《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即表现为该部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体系被建筑在戊戌变法这一中心事件之上。钱基博在《序》中就特别指出“是编叙戊戌政变本末，详见康有为、梁启超篇，而戊戌党人之不履人意，则见义于章炳麟篇，借章氏之论以畅发之。”³⁾而对于一部以文体为“纲”、以作家为“目”的文学史来说，书中的两位起止人物——王闿运与胡适，自然对全篇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那么这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与本部书的中心事件——戊戌变法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首先来看王闿运。作为钱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开端人物的王闿运，除了其思想一度“开风气之先，缩新旧之枢”⁴⁾、其文“各体高绝”之外，还有怎样的原因使其能够立于如此重要的位置？

细究王闿运一生的经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⁵⁾王尚今文家言，尤擅“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家言，著作颇丰，其以致用为目的，把《公羊》学的学说理论，“与当

1) 钱钟汉(钱基博之侄)语，转引自李洪岩《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 钱基博，《自我检讨书》，《天涯》，2003年第1期，第65页。

3)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序》，《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4)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5)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版增订识语》，《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09、510页。

* 唐金海 复旦大学中文系 教授

** 陆颖蓉 复旦大学中文系 研究生

前的政治实际结合在一起”。⁶⁾1897年，王应四川总督丁宝祜邀请，担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受学弟子众多，其中就有后来开创蜀学的廖平；而南海康有为初从粤中大儒朱次琦学，酷好《周礼》，“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曾游南海广雅书院，为康有为通《公羊》，明改制。戊戌变法中另一位重要人物、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提到“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而梁启超的思想则深受康有为的启发和引导。由此可见从王闿运到廖平，再到康有为、梁启超，有着一个学说思想、学术理论的沿袭和传承的脉络。虽然“闿运晚年倦倦逊朝，致讥民国，而不知其张《公羊》以言改制，为今文学者固其壁垒，即不啻为革命家言导其前茅。”⁷⁾不管王闿运本人对戊戌变法抱有何种看法，但他是戊戌变法思想的最初启蒙者，这一点似无异议。

再看胡适。梁启超是胡适少年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位思想启蒙者。借用梁漱溟在回忆梁启超的文章中所提到的情景，在戊戌变法前后，“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梁启超)的天下”。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曾详细记述他在各个方面得益于梁启超的经过，承认“自己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但与此同时，胡适又不无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梁启超)走到一点上，还想往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在五四前后，胡适以少年“暴得大名”之时，梁启超正“颇能努力地跟着一班少年跑”，梁所跟着跑的“少年”，恰恰正是胡适等人。很显然，梁启超曾经领风气之先、启蒙戊戌变法的思想，此时已然不能肩负起一个“带路人”的职责，在西潮冲击之下已渐次过时、落伍。胡适与梁启超关系的错位正说明了戊戌影响的逐渐式微。

如果把梁启超作为中心人物，可以看到“王闿运——梁启超——胡适”这种过渡和变化，其实也就是戊戌变法思想从最初启蒙到笼罩整个思想界，再到最后逐渐边缘化的过程。而以戊戌变法为文学史中心线索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不仅是如钱基博所言描述了一个“疑古非圣”的脉络，同时也记述了戊戌变法思想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起承转合的发展变化。

6) 萧艾，《王湘绮评传》，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12-119页。

7)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二、“叩兩端而察其所變”——從王闿運到胡适的兩大轉向

在清末民初，中西思想交汇，传统文化转型肇始的年代中，传统的文学观念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革和转向？我们可以从钱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把王闿运和胡适作为文学史起止的代表人物中，进一步探究其价值指向。

最明显的一点莫过于语体的变化。

即使在当时，王闿运的古文功底也为学人所叹服。世称古文功底厚重的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也盛赞王闿运文章“组比工夫，隐而不现，浮枝既削，古艳自生”，⁸⁾其诗“华藻丽密，词气苍劲”⁹⁾。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评价其诗曰：“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更是将王闿运点为托塔天王晁盖，推其为近代诗坛“旧头领”、湖湘诗派之领袖，赞曰：“陶堂老去弥之死，晚主诗盟一世雄。得有斯人力夏古，公然高咏启宗风。”¹⁰⁾认为“其诗致力于汉魏六朝至深，初唐以后，若不甚措意者。学瞻才高，一时无偶”。¹¹⁾

与此相反，新文化倡导者胡适认为“中国的古文在二千年前已经成了一种死文字”¹²⁾，“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¹³⁾，“古文死了二千年了，他的不孝子孙瞒住大家，不肯替他发丧举哀；现在我们来替他正式发讣文，报告天下”¹⁴⁾，在根本上否定了中国传统的语言形式。从理论上著名的“八不主义”，到创作的《尝试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开拓者，不断在中国文学史的视野中鼓吹和

8)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0页。

9)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7-58页。

10) 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50页。

11) 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51页。

12)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申报馆，1924年版，75页。

13)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153页。

14)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重构白話文的合法地位。錢著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提到，胡適歸國，“都講京師，倡為白話文，風靡一時”¹⁵。

由此可以總結出，從王闈運到胡適，是一個從古文到白話的轉向過程，王闈運執了古文的一端，胡適則高舉白話的一端。

而另一種價值指向，則來自於文學觀念的變化。

王闈運論文，其最大的特點是主張復古，認為“文無家數，有時代”¹⁶。所謂文有時代，是指文章存在着古今雅俗的區別，僅就這個意義而言，無疑是正確的。劉勰早在《文心雕龍》中說過：“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¹⁷，文學是時代精神與生活風尚的綜合反映，必然隨着社會的變化不斷地向前發展，不同時代的文學必然染具不同的風格特色。王闈運看到時代變遷對散文創作的影響，但並未用進化的觀點看待文學的發展，而是持一種今不如昔的文學退化論，“今人言語意趣皆異古人”，“言今事輒有今意，意今則語凡”，“今所以不及古者，習俗使之然也”。因此他倡言復古，認為“詞不追古，則意必循今，率意以言，違經益遠”¹⁸，這種觀點明顯地承繼了明代前後七子復古主義文藝觀的衣鉢。王闈運對傳統文化與文學觀念的固守，由此可見一斑。事實上，在王闈運當時所處的時代中，在傳統文學領域內，依然是復古派的天下。

而胡適其名中的“適”正取自《天演論》中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他的文學觀正如他自己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所提到的“對於文學的態度，始終只是一個歷史進化的態度”¹⁹。在1915年6月6日的留美日記中，胡適第一次運用進化論思考中國文學的發展變化，他提出“詞乃詩之進化”²⁰。次年4月5日，他運用進化論更為全面、深入地闡發了中國文學體裁的發展變化，其文學進化論的思想已初步形成。胡適認為“文學革命，在吾國史上非創見也。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一大革命也。又一變為五言，七言，古詩，二大革命也。賦之變

為無韻之駢文，三大革命也。古詩之變為律詩，四大革命也。詩之變為詞，五大革命也。詞之變為曲，為劇本，六大革命也”²¹。需要注意的是，胡適在這裡所謂的“革命”一詞與後來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革命”截然不同。這裡的“革命”本質上就是“進化”，用胡適自己的話解釋就是“革命潮流即天演進化之迹。自其異者言之，謂之‘革命’。自其循序漸進之迹言之，即謂之‘進化’可也”。²²

即如上述，可見錢著《中國現代文學史》“叩其兩端”“察其所變”的另一個價值指向，即是從王闈運到胡適，又是一個復古主義文藝觀到進化論文藝觀的演變過程，王闈運無疑是復古派的代表人物，而胡適當仁不讓地佔據了進化論的一端。

三、“察其變而觀其所執”——錢基博在兩種轉向中所持的立場

從上文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在《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框架內，從王闈運到胡適的兩端中，至少發生着兩種明顯的變化，一是文言白話之變，二是復古進化之變。

既然文學史不可能是純客觀、純史料性的工作，那麼文學史寫作中必然滲透了作者本人的價值判斷——或隱藏或直白地存在於文學史的字里行間。錢著《現代中國文學史》亦然。

錢基博所處的時代，是“駸駸乎白話篡文言之統，而與代興為文章之宗”²³的時期，此時的文言與白話之爭，是一個時代的大話題。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對“文”、“文學”定義時，錢基博迴避了文言與白話的問題，在談當時激烈的文白之爭時，也只是列舉了主張白話取代言言的胡適等人的看法，以及反對其主張的胡先驌等人的主張，並沒有透露自己的看法。然而仔細品讀之後可以發

15)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岳麓書社，1986年版，401頁。

16) 錢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學風：湘學略》，岳麓書社，1985年版，58頁。

17) 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407頁。

18)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44頁。

19)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集》第三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253頁。

20)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65頁。

21)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52-353頁。

22)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頁。

23)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頁。

现，虽然钱基博曾亲自动手编写过一本白话文读本《语体文范》，虽然他提出“语体文也是文章的一种”²⁴⁾，但是他对白话文的态度始终是审慎的，在审美趣味上也仍偏重文言。

首先，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框架中可以发现，书中叙述的古文学与新文学两派，其中对古文学一派的著述较为详尽，立论也多有回护。钱基博在新文学中提到的三种文体，在他看来代表了白话取代文言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即“开通俗之文言”——“创逻辑之古文”——“倡白话之诗文”。“开通俗之文言”的新民体实际上是文言文变革为白话文的一种过渡性质的文体，“创逻辑之古文”的逻辑文事实上是以文言形式写作的政论文体式，借用胡适的话说这其实都是“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如今看来真正称得上是“新文学”范畴的似乎只有胡适、徐志摩等人的白话文。可以说整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绝大部分章节是在对以古文为载体的文类进行审美与阐述。

其次，1920年前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国语”后，钱基博亲自编写《语体文范》一书，而且在与裘廷梁的文白之争中，他也强调“语体文也是文章的一种”，据此虽然可以推断出钱基博对白话并不是抱有完全否定的态度，但《语体文范》只是一种白话文读本，其成书的目的是为了教学的需要，简单而言，这是一本教授如何写好白话文的启蒙普及书籍，它的读者群是面向大众的。当写作《现代中国文学史》时，虽然此时白话文替代古文的趋势愈演愈烈，钱基博还是运用了他最拿手的文言。除了他的古文“实在清粹漂亮”²⁵⁾之外，恐怕也是因为这部“史”的著作面向的是对文学钻研颇深的知识分子。就像当年的小说界革命中，夏曾佑提倡小说，但仍然认为小说是给普通人看的，士大夫不必看，该运动的领军人物梁启超虽然极力鼓吹“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但也对士大夫进入小说阅读群懊恼不已，钱基博的心态正是与夏、梁不谋而合——在面对大众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时，文学需有双重的标准和定位。对钱基博而言，一旦进入精英文学的范畴中进行创作，

文言仍是语体的不二选择，而在文学需要承担启蒙责任时，白话则是值得一用的工具。

从以上两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相比白话，钱基博对于文言有着更深的认同感，在运用以及审美上也更得心应手。

那么钱基博在复古与进化的文艺观中，立场又是如何的呢？

的确，在钱基博所处的年代，许多的文学史著作都是在进化论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及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也很容易就能找到进化论思想影响的痕迹。如在论中外文体发展时，认为“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段也。”²⁶⁾

但考察钱基博的生平可以发现，他所受的进化论影响，源于其青少年时期。他偶尔看到《格致新报》，乃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发行，月出一期，中间登着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我读了，觉得耳目一新”。²⁷⁾钱基博所接触的“进化论”思想，来源自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天演论》本身就是一部建立在“循环论”基础上的“进化论”著作。译者严复是在《周易》的基础上来认识进化论的，而不是用进化论来否定《周易》。严复在《天演论》序言中说“西国近二百年学术之盛，远迈前古，其所得于格致而著为精理公例者，在在见极，而吾《易》之所著，则往往先之。”²⁸⁾他看到了西学与中国古籍的互通之处，用《周易》对进化论进行了改写和调和。更重要的是《周易》是严复理解西方学术思想的基础，在解释进化论时也无法免俗。1905年，正值严复介绍西学最盛期，他在《老子评点》中对《老子》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批注道：“天演开宗语”，“此四语括尽达尔文新理。至哉！”²⁹⁾中国古代盛行复古主义，此“天演”理论就绝非“进化论”。这里严复意欲表达的是他内心对循环论的深信不

24) 钱基博语，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先生与钱钟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25) 钱基博先生自成一家之言——《现代中国文学史》七十年后新版有感》，《文汇报》，2004年12月18日。

26)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27) 钱基博，《自我检讨书》，《天涯》，2003年第1期，第65页。

28) 严复，《〈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1321页。

29) 严复，《老子评点》，《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1077页。

疑。“万化无往而不复。飘风骤雨，往之盛且疾也。”³⁰⁾他用《周易》“不反则改，不反则殆，此化所以无往而不复也”代替了进化论，既然“万化无往而不复”，很显然就是循环论而非进化论。更何况“进化论”的简单化线性逻辑造成的乐观主义，在《天演论》中也看不到。《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更多强调的是竞争意识。严复自始至终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进化并不抱乐观态度。由此可以得到的推论是，《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是以循环论为基点的，钱基博受到《天演论》的启发所形成的思想就不可能是纯粹的线性进化论思维。需要注意的是，钱基博认为“文学史者，则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也。”³¹⁾并且把《周易》作为文学史写作的指导用书³²⁾，这一点也可以证明，《现代中国文学史》不是一部完全由进化论思想所统帅的文学史著作，《周易》中“万化无往而不复”的循环论思想寓于其中。

而且，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版增订识语》中勾勒了这样一个“疑古非圣”的文学历史脉络：“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闾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这一线索，又带着令人深思的圆圈式循环的色彩。

由此可见，在循环论与进化论之间，虽然不能说钱基博完全偏向于复古主义，但至少从他所受的影响以及从钱著文学史本身的体例来看，循环论仍在他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四、“觀其執而究其所因”——錢基博持此態度的原因

钱基博生于1887年，王闾运生于1833年，而胡适生于1891年。从所处时代来看，钱基博成长的社会环境与胡适更为接近，但事实上，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钱基博思想的内核更接近于王闾运。钱著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王闾运极尽溢美之词，称其“开风气之先，绾新旧之枢”，为“文章老宿”、“各体高绝”，而对胡适却不尽然。虽然胡适对钱基博的影响也很大，如《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动机、其中所包含的问题意识和实用精神都与胡适息息相关。但诚如钱基博自己在晚年所言，“我的思想，和胡适思想不相容”。³³⁾在两端之中，他并不是站在一个中立的位置，而是偏向于起点的那一端。

那么这种有意无意中的偏向原因何在呢？

从个性气质角度看，钱基博在文学史中用了“天性愚鲁”四个字来形容王闾运，称其“日诵不及百言，又不能尽解。同塾者嗤之。”³⁴⁾胡适则恰恰相反，五岁就能背诵四书三经以及《小学》、《礼记》等书，钱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记载“(胡适)五岁，即就外傅，授《孝经》，朱子《小学》、四书、《易》、《书》、《诗》三经及《礼记》，皆能背诵。”³⁵⁾而根据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里的回忆，“祖父认为钟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³⁶⁾又说钱基博因为念书不开窍，“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梁漱溟在比较梁启超和蔡元培时说，反应快的人“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技能吸收，最善发挥”，不仅如此，还能够“发皇于外，传达给人”³⁷⁾。胡适在早慧而“少得大名”这一点上与梁启超非常类似，他们善于接受新事物，并能很快做出反馈，调整自身的思想。新文学发生发展百余年至今，也不乏这样的先例，这类人治学时有关浮躁之气、伺机迎合之风，但又适合引领新的潮流与动向。但王、钱

30) 严复，《老子评点》，《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1084页。

31)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32)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中特别指出“圣人以有见天下之动观其会通”和“《易》有圣人之道，……以动者尚其变，……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33) 钱基博，《自我检讨书》，《天涯》，2003年第1期，第66页。

34)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9页。

35) 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480页。

36) 杨绛，《将饮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37) 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260页。

这样的学人就不同，他们善于在认定某件事物后笨鸟先飞式地痛下苦功，于做学问上，当然可以使所学深厚，但于接受新事物上，多少需要消化的时间，无法很快调整思路，容易趋向保守。所以深受私塾教育影响的钱基博骨子里对文言和循环论的偏向就显得非常自然。

从教育模式来看。钱基博和王闾运主要都以吸收旧学知识为主。钱氏家族“儒于清”³⁸⁾，而钱基博对家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涵有着深切的体认和强烈的认同。在文化家族的心理自觉下，钱基博“儒于清”的具体表现，就是自童年时期开始接受私塾教育。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强调的是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形式是呆板的，凝固的。即使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教育制度大变迁的时期，家塾教育也保持着原有的惯性。这使得钱基博国学根基深厚，即使此后对西学甚感兴趣，但主要还是致力于传统经典的研究和鉴赏。而胡适虽然有9年私塾教育的经历，有一定的旧学基础，但他在十四岁之后接受了新式学堂的教育，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接触西学，眼界大开，后又师从杜威，接受了其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在变革动荡的时代，胡适和钱基博身受不同教育模式的侵染，各自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使得他们在人生价值和治学精神上相互认同的根基很少，他们对新文化等抱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从人生经历来看。钱基博青年时代曾一度从政，1909年入过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的幕府，1911年辛亥革命后，又入军政，任锡金军政分府秘书，此后几年才步入教育界和文坛。这一历程与科举出生的王闾运惊人的一致。王在太平天国时入曾国藩幕府，后又参军事，其后主办学堂，生前文名甚隆。王、钱学而优则仕的人生历练，即可看出传统文化对于他们的深刻影响。

而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构成的转型。旅美著名学者余英时认为，“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但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实质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³⁹⁾，简单而言就是近代中国存在传统的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大转变。古代科举选官制度之下，位

于“四民之首”的士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心。废除科举之后，原本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解体，在这场社会变迁之中，士这一社群受到了最大的冲击，因为废科举兴学堂的直接结果就是改变了社会流动的取向，从体制上切断了“学而优则仕”的仕途，新式教育制度产生的是“自由浮动”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的士大夫，如刘大鹏所言“平居乡里，所言所行，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⁴⁰⁾。作为表率“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他们有务本的义务，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而传统文化观念中知识分子与士大夫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参政与议政。钱基博入幕府、入军政，把参政和端正世道人心作为一种必须认真贯彻的人生信念，他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而胡适则倾向于“讲学复议政”，即把对国事的关心停止在议政阶段，在晚年自述中，他称自己“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⁴¹⁾。在清季民初的新旧之争中，正统衰弱、边缘上升，社会变迁导致的自身文化立足点的激烈动荡，致使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在思想和心态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却也每有相近之处。钱基博的个性、教育和经历使得他对自身社会角色的体认更接近传统的士大夫阶层，而胡适则是新文化运动前后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为什么钱基博在文学变动中的思想观念更倾向于王闾运，而与胡适虽多有不同，却又有不少相似的原因所在。

优秀的文学史的撰写是文学与历史兼重的复杂的动态组合，是理性与感性兼备的又以能动性为主导的学术劳作，旨在在敬畏历史的基础上，以个性化的创造性劳动达到最大程度的学术共识。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更多地做的是“温故而知新”的工作，但其显示的文学价值观底蕴，确有开“现代”之先的启新意义，正如著名美学理论家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论到的一个深刻而有规律性的命题：“历史上向前一步的进展，往往是伴着向后一步的探本穷源。”⁴²⁾ 鉴于上文评析，我们认为，钱基博先生的文学观念及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价值观底蕴也将永载史册，也应成为尔后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有益参照。

<参考文献>

38)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897年2月16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39)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63页。

40)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41) 钱基博，《自我检讨书》，《天涯》，2003年第1期，第65页。

42)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钱钟汉(钱基博之侄)语, 转引自李洪岩, 《钱钟书与近代学人》,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 岳麓书社, 1986
 _____, 《自我检讨书》, 《天涯》, 2003年第1期。
 _____, 《现代中国文学史》,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萧艾, 《王湘琦评传》, 岳麓书社, 1997。
 汪辟疆, 《光宣诗坛点将录》, 《汪辟疆说近代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胡适, 《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 申报馆, 1924。
 _____,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_____, 《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 《胡适文集》(第3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_____, 《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钱基博、李肖聃, 《近百年湖南学风: 湘学略》, 岳麓书社, 1985。
 王运熙、周锋, 《文心雕龙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钱基博语, 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先生与钱钟书》,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 钱基博先生自成一家之言——〈现代中国文学史〉七十年后新版有感〉, 《文汇报》, 2004。
 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严复, 《〈天演论〉自序》, 《严复集》第五册,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1321页。
 _____, 《老子评点》, 《严复集》第四册, 中华书局, 1986。
 杨绛, 《将饮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梁漱溟, 《纪念梁任公先生》, 《追忆梁启超》,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刘大鹏, 《退想斋日记》(1897年2月16日),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余英时, 《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中国知识分子论》,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唐德刚译注, 《胡适口述自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宗白华,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美学散步》,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중심어 : 현대중국문학사, 전기박, 王闓運, 胡適, “叩兩端”

원고접수일	2008. 1. 4
심사일정	2008. 2. 15
1차수정	2008. 2. 26
게재확정	2008. 3. 7
출간	2008. 3. 30

<국문요약>

본문은 錢基博의 《現代中國文學史》 “叩兩端”의 새로운 고찰을 통하여 “探其傳承”, “察其所變”, “觀其所執”, “究其所因” 네 가지 관점에서 錢基博과 그의 《現代中國文學史》의 문학사 가치관을 살펴보고자 한다.